

中国传统音乐学丛书

丛书主编 王耀华

中国音乐考古学

ZHONGGUO/CHUANTONG/YINYUEXUE/CONGSHU/Zhongguo/Yinyue/Kaoguxue

王子初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ZHONGGUO CHUANTONG YINYUEXUE



CONGSHU Zhongguo Yinyue Kexue

中国传统音乐学丛书

丛书主编 王耀华

中国音乐考古学

王子初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音乐考古学/王子初著. -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10

(中国传统音乐学)

ISBN 7-5334-3553-2

I. 中… II. ①王… III. 古乐器-考古学-中国
IV. K8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1819 号

·丛书主编 王耀华·

中国传统音乐学丛书

中国音乐考古学

王子初 著

出版	福建教育出版社
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3725592 3726971 传真: 3726980 网址: www.fep.com.cn)
印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 350012)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75
插页	4
字数	502 千字
版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7-5334-3553-2/K·95
定价	40.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 (电话: 0591-3786692) 调换。

总 序

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对硕士、博士研究生进行教学的过程中,由于专业方向的关系,需要开设诸如《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国音乐结构学》、《中国音乐文献学》、《中国音乐美学》之类的课程,却又苦于缺乏教师、缺少较为系统的教学参考书,于是萌发了组织编写一套《中国传统音乐学丛书》的念头。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出现了《乐记》、《吕氏春秋》等音乐学的代表性的著作。在相传为公孙尼子撰写的《乐记》中,论及了有关音乐本原、音乐美感、音乐的社会作用、乐和礼的关系等,是为音乐哲学的滥觞性著作。由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的《吕氏春秋》,则留下了有关远古音乐、音乐与自然社会政治关系、尤其是音律方面的记载。此后,在各朝各代的志书中都有《音乐志》(或《礼乐志》),全面介绍当时的音乐制度、乐律、乐队、乐曲和礼仪规范等内容。另外,在音乐美学方面,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周敦颐的“淡”“和”、朱熹的“中和”和徐上瀛《谿山琴况》等音乐美学观和美学著作。在乐律学研究方面,有京房的六十律、钱乐之和沈重的三百六十律、何承天的新律、荀勖的笛律、蔡元定的三分损益十八律、朱载堉的新法密率(十二平均律)。在宫调理论方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旋宫理论和调式运用,汉代民间音乐中有“相和三调”,魏晋南北朝有清商三调、

笛上三调，隋唐时期有八声音阶、燕乐二十八调、八十四调和犯调、移调理论，宋代有“为调式”“之调式”系统，元代的北曲十七调、南曲十三调，明代的九宫，清代的南北曲各十二宫调等。在词调音乐、琴学、表演艺术理论和音乐百科全书式著作方面，有：张炎《词源》、沈括《梦溪笔谈》、王灼《碧鸡漫志》、刘向《琴说》、朱长文《琴史》、袁桷《琴述》、刘籍《琴议》、陈旸《乐书》、燕南芝庵《唱论》、周德清《中原音韵》、徐大椿《乐府传声》等。以上这些文人及其著作都曾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乐学、律学、宫调理论、美学等规律作过论述，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此后，中国又迎来了中西文化交流颇为繁盛的20世纪。中国音乐家开始了学习西方的音乐理论，并且试图以此来研究本民族的传统音乐，发展民族的新音乐。然而，中西文化之间，除了纯粹的自然规律，包括人类文明所创造的高科技手段的物质性规律不因国别、族别差异而有任何改变之外，在艺术规律和艺术手段之中，人们对于自然和物质手段的选择却是大异其趣的。正因为有了人的选择、加工、处理方法的不同，所以，在相同的物质根据中所表现出来的色彩、风味、性格、情趣方面却大相径庭，而出现民族特点、地方特色、时代风格的千差万别。对于音乐文化来说，物理学中的声学基本理论固然相同，音乐形态诸要素的选择和音乐审美观的理解却因民族、地域、时代的不同而形成差异。虽然中国传统音乐自古以来就在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与世界各地的传统音乐相互吸收、融合，使彼此间有许多相通相同之处，但是，无论是基础理论的律、调、谱、器，或者是音乐审美的虚、实、意、象，甚至至于对乐音的清、浊、纯、噪等方面，都表现出与西方音乐理论的许多差别。因此，整理自己传统乐学、律

学、音乐美学的历史理论，总结可供当前民族音乐使用的应用理论，就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者的使命和责任。这不仅有利于传统音乐的教学，使我们的下一代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特殊规律，而且为正确理解民族传统音乐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发展民族新音乐做一些铺垫性工作。

20世纪20年代以来，童斐、王光祈等先驱者进行了可贵的探索。童斐的《中乐寻源》在对中西音乐理论的相同之处作出初步总结的同时，也大略指出了中西音阶的相异。王光祈既强调“西人科学常识丰富，遇事观察锐利”，应当重视西学，又强调“虽有曾受西乐教育之士，若无本国音乐材料（乐理及作品等等），则至多只能造成一位‘西洋音乐家’而已。于‘国乐’前途，仍无何等帮助”。指出了掌握西学的目的是整理中国遗产，研究中国音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吕骥为首的延安鲁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由王震亚、谢功成等人组成的重庆青木关音乐学院“山歌社”，以刘天华为主帅的“国乐改进社”，着力于民族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进行理论研究，努力探索新音乐创作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点。杨荫浏则熔理论与实践于一炉，献毕生精力于中国传统音乐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对中国传统音乐、中国音乐史、中国传统乐律学研究作出了全面的贡献。其他如缪天瑞、沈知白、廖辅叔、曹安和、钱仁康、吉联抗等，以及50年代以来的李纯一、郭乃安、冯文慈、黄翔鹏、赵宋光、夏野、童忠良、汪毓和、杨匡民等，在中国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音乐文献学、音乐美学等领域辛勤耕耘，也都为中国传统音乐学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特别应提到的是，黄翔鹏对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乐律学史、音乐考古学的研究；他所提出的“传统是一条河流”的命题以及“身入

古墓，心在人间”，“神游往古，心追方来”等治学思想；他所提倡的“宏观的史、论研究必与微观的艺术分析密切结合，‘言必有物，虚实并务’；打破门户之见，使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与民俗学、乐律学等各种音乐学的边缘学科熔于一炉，来进行系统化的综合研究”的研究方法。这些对促进中国传统音乐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而成长起来的中青年音乐学者，抓住时代所提供的难得机遇，投入民族音乐集成的浩大工程之中，深入民间，深入生活，在以上这些前贤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贡献。

本丛书的诸位作者及其成果，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他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浸润着中华民族优秀音乐传统的雨露，吸吮着前辈、同仁的学术养分，试图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某些方面进行梳理、整合工作。这既是为有志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青年学子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材料，也起到为中国传统音乐学的学术建设添砖加瓦的作用。我们殷切地期待着读者无私的指教和支持，使这些成果不断地臻于更科学、系统、完善。这也是组织编写、出版该套丛书的初衷。

最后谨对本丛书各位作者的辛勤劳动致以崇高的敬意！对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阙国虬社长、林毓琮主编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谢忱！

王耀华 谨识

壬午年十一月三日

前 言

这本《中国音乐考古学》，是为中国音乐考古学和中国音乐史学专业的研究生编写的教材，它算不上本学科系统的《中国音乐考古学》理论专著，只是该学科领域的相关基础知识，是学习和研究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基础知识读物。

本书以叙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音乐文物为主要表述方式。从这一点上看，似乎更应该称之为《音乐文物学基础》。

“考古学”和“文物学”究竟有什么不同？

考古学应该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本书的《绪论》中提到，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考古学的定义并不完全统一。英国学者D.G. 赫果斯(D.G.Hogarth)认为考古学是“研究人类过去物质遗存的科学”。法国人S. 列纳克(S.Reinach)认为考古学是“根据造型或加工的遗物来解明过去的科学”。前苏联的A.B. 阿尔茨霍夫斯基(A.B.Арцхевский)的定义为“根据地下的实物史料来研究人类历史上的过去的科学”。日本学者滨田耕作说考古学是“研究过去人类物质遗物的科学”。这四人是国际上较有影响的考古学家，他们对考古学所下的定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上可以看出，他们的理论有着明显的共同点，即“研究人类过去的物质文化”。但从完整地表达一门学科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的角度考察，四人的定义都有所不足。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考古学的完整定义应该是：“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夏鼐、王仲殊：《考古学》）

文物学，顾名思义，应该是专门研究文物的学问。文物，是指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不难看出，文物学所研究的对象，已经包含在考古学研究对象之中。只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更为宽泛，它还包含了遗物之外的“遗迹”在内。在研究的内容方面，无论考古学还是文物学，它们都要涉及文物的外部和内在的种种特性，如文物的保存情况（品相）、色泽、材质、尺寸、质量、来源（出土资料、历史学资料）等等。在研究方法方面，考古学和文物学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它们都会借助一些相同的方法，如化学的、物理的、甚至是历史的方法。

考古学和文物学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它们研究文物的目的不同。考古学研究文物，是通过文物来探知历史，所以它的学科性质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文物学研究文物，是借了解文物自身的种种特质来探知文物的价值。同时，考古学研究的文物主要来自调查发掘，研究中较注重文物在时代上的古远，尤其关注人类发明文字之前或早期的文物，对文物的价值取向上较注重文物的历史价值。文物学研究文物，则较多注意流传有序的传世品，较注重文物的品相、材质的贵重、工艺的精细等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由于文物学是专门研究文物的学问，考古学在通过历史文化遗物来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常常会借助文物学的研究成果。而文物学的研究对象，则大量来自考古学发掘的结果；有关文物的研究资料，也大量来自考古发掘资料。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中，这两门学科不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甚至在有关专家及他们的职业等方面，都有大量的重合和交织。事实上，一些最著名的史学家、考古学家，就是最好的文物专家。可以说，考古学和文物学是一对难分难解的联体婴儿。

本书没有定名为《音乐文物学基础》，而定名为《中国音乐

考古学》，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本书研究文物的目的，在于研究中国的音乐历史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不仅仅在于探究这些琳琅满目的音乐文物自身特质及其艺术、经济价值。本书在罗列介绍中国各时代的音乐文物时，是以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为主线，以中国古代的主要音乐形态交替更迭为基础的。所以本书的宗旨与“文物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本书的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重点论述了有关音乐考古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该学科的定义、性质、研究对象及相关学科等；也简单地介绍了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和现状。第二章到第八章，每一章节实际体现了具有较为鲜明的某种历史时代特征和音乐形态特征。在其音乐考古学的总体框架下，按乐器的种类分别叙述，来演示这一时期最有特点的音乐文化。第九章阐述的是有关音乐考古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包括田野考古方法、音乐考古学断代方法、测音方法、音乐文物命名方法、音乐文物分类方法等等。最后一章可以看做为附录，收录了作者近年在音乐考古学方面的几篇较有代表性的专论，包括《礼乐重器缚的发掘与研究》、《晋侯苏钟的音乐学研究》、《珠海郭氏藏西汉宗庙编磬研究》和《且末扎滚鲁克箜篌的形制结构及其复原研究》等，以图增加读者在了解目前中国音乐考古学这门年轻学科发展研究现状的感性认识。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第二章到第八章，采用了以各个历史时期块面上所见音乐文物分类叙述的写法，也是由于当前中国音乐考古学这一门新学科自身的局限。本书《绪论》阐述了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形成的短暂历程，以及它仍处在自身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的现状。一般来说，一门成熟的学科，应该具备如下条件：明确的研究目的和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较为系统的基础理论著作；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专家队伍；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等。

显然，以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音乐考古学，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门学科的幼稚和缺憾，它在各个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建设和发展。

作为一般考古学在音乐艺术领域内的一个专门分支，音乐考古学进入作为考古学主体的发掘领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根据目前国家对考古事业的管理制度，中国音乐考古学家在身份和职业上，似乎均未被真正纳入“考古界”的行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发掘领域。所以，当前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研究中，音乐文物的研究有着突出的实际意义。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实际上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界发表的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作案头研究阶段。对于中国寥寥可数的专业音乐考古学工作者来说，通过研究考古界发表的出土音乐文物和相关资料，来探讨中国音乐史的发展规律的基本工作模式，将会持续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当然，少数一些有眼光的音乐考古工作者已经充分认识到音乐考古发掘的重要性，他们尽可能与拥有考古发掘权的单位，如一些大学的考古专业和历史专业，国家或各省市文化管理部门的考古研究机构和各地的博物馆等，加强联系和合作，尽可能深入到发现音乐文物的考古发掘工地，参与遗址的清理工作，参与文物的修复和研究。运用自己在音乐考古学方面的一些优势，如音乐学的方法和手段，从出土的音乐文物上，发掘出如文物的音乐音响性能、使用手法等方面的更多更丰富的历史内涵来。

这本《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写作，是建立在我主持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资料基础上的。本书的第二章到第八章，所叙述的各个历史时期块面上所见的音乐文物资料，基本上来自于这个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前10卷。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是经历了一条长达14年的曲折历程后取得的，很值得回顾。可以这样说，本书不过是《中国音乐文物大

系)这个中国音乐文物资料库中一个小小的后续成果。

1987年,在音乐研究所乔建中所长的斡旋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作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以我的导师黄翔鹏先生的名义立项。但因当时黄先生患肺气肿已经到了行动困难的地步,无法参与该项目的具体工作,几经周折,建中所长在中国音乐史研究室组成了项目的总编辑部,亲自担任了总编辑部主任,并采取了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各人分别应承编撰一个省卷的工作方式。1988年7月,我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毕业,分配到该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史研究室工作。一到音乐研究所,建中先生即安排我参加这个项目。当时研究室各人承担的省卷已经选择完毕,我在剩余的省份中,选择了湖北省,承担了该省卷的主编工作。

对这个项目的性质及其终端成果,各人存在不同的认识。当时虽然已有分工,却无一人投入实际编撰工作。因为有关项目的编撰工作,总编辑部尚无章程,亦无编撰体例。我在接受了《湖北卷》的任务以后,首先考虑对湖北全省进行一次有关音乐文物的全面普查,就一头扎到了湖北。在武汉,我有幸得到了曾侯乙墓的发掘者之一、当时的湖北省博物馆音乐研究室负责人冯光生先生的全力支持;得到了该博物馆的其他朋友们的热情接待和悉心合作。在其后的两年间,我独自一人扛着测音仪器和照相设备等行李,进行了湖北音乐文物普查,足迹遍及湖北全省的18万平方千米,考察了湖北10余市、70余县和8个地区的绝大部分文博馆所,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后又由冯光生和湖北省博物馆的朋友们进行了图片资料的拍摄和复查,并共同完成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首卷《湖北卷》的撰稿。

在编定《湖北卷》的同时,我起草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撰体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工作条例》以及《中国音乐文物大

系音乐文物命名法》、《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音乐文物分类方法》等一系列文件。在编订这些文件的过程中，得到了恩师黄翔鹏先生的谆谆教诲，也多次听取了冯光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王世民等人的宝贵意见，使得《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撰体例》等文件不断完善。其后，《北京卷》、《甘肃卷》等开始按此《体例》相继开展工作。

《湖北卷》完成后，由于项目的经费严重不足，也因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撰方针方面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导致于1990~1993年间，项目的工作基本陷于停顿。直至1994年，经建中所长提议，黄翔鹏先生任命我担任项目的执行副主编，正式主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编撰和出版工作。上任以后，我首先明确了黄翔鹏先生关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不是精选，而是音乐文物集成”的主导思想，并确认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撰体例》中既定的编辑方针。同时全力以赴，设法去争取国家财政对项目出版方面的支持。在当时的国务院秘书四局罗迎难、国家财政部文化处傅栋和国家文物局刘小和等热心中国文化事业的朋友们共同努力下，1995年5月，喜讯传来，《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终于得到了国家财政部专项资金的支持，项目的编撰和出版都有了保证。这一拖延已达8年之久的工作得以全面展开。同年，项目总编辑部与河南教育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1996年首卷《湖北卷》面世之时，总主编翔鹏先生为该书专门题写了前言。1997年5月，黄先生在见到了《北京卷》的色样后不久，不幸与世长辞了。

继《湖北卷》和《北京卷》面世之后，项目的陕西、天津、上海、江苏、四川、河南、新疆、甘肃、山西等省卷陆续出版。我在每一卷的卷首都保留了黄翔鹏先生的《前言》，以此弘扬恩师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并在《编者的话》和各分卷的《后记》

中，对该项目的倡导者吕骥和夏鼐两位师长，以及所有对《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有贡献的前辈学者、同龄人和后辈学子都作了应有的体现。1999年，《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大奖。

目前最后的《山东卷》已出版，时间已经到了公元2001年年底。

已出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包括了12个省卷，分10册装订，共收录了文字及数据资料近200万言，彩色、黑白照片及各类拓片、线描图5000余幅。所收录的文物包括：大量考古发现的和传世的各种古代乐器舞具，反映音乐内容的器皿饰绘、雕砖石刻、纸帛绘画、俑人泥塑、洞窟壁画、书谱经卷等等。所收录的文物中，不乏历见著录的传世名器，也不乏闻名于世的重大考古发现；但更多的是以往鲜为人知的文物，它们在本书中是第一次集中性面世。这些文物的年代，从约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直到清代末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丰富多彩。该书采用全彩印刷，八开本豪华装帧，以尽可能博大的气派，再现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套专业音乐书籍，也是中国音乐考古学方面的第一部重典，对中国音乐考古事业的推动是不言而喻的。

1998年，在上述12个省卷（I期工程）初步完稿以后，我进一步申请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期工程》项目，并在同年被批准为国家“九五”艺术学科重点项目。在其后的两年里，项目总编辑部全面继承了I期工程的宗旨、体例和工作方法，并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有关省市文博部门的大力支持，特别是项目继续获得了国家财政部大额经费的支持，使得项目的全面完成有了基本的保证。我和全体工作人员积极投入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

果，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的目标，初步完成了《江西卷》、《湖南卷》、《内蒙卷》、《河北卷》、《青海卷》、《安徽卷》，其他如《浙江卷》、《辽宁卷》、《福建卷》也陆续开始文物普查、测录资料、拍摄图片等工作。

14年来，我考察音乐文物的足迹已遍及大半个中国。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迄今还有十余个省卷尚未展开工作。要让后面这十余本书摆上书架，工作量之大，令人望而生畏，真有点“前途茫茫”之感。我深深地感悟到，这是压在我身上的一副重担，一副历史的重担：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完成这一宏大的学术事业，是给恩师翔鹏先生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交代。《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给后人留下的，应该是一笔有用的学术财富，而不能是一种难以弥补的遗憾。

问题是，要完成这一历史的重担，必须考虑培养新人了。培养新生的学术骨干，壮大专家队伍，不仅是以更高的质量来完成本项目的基本保证，也是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的历史任务。所以在我培养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生的实践中，我开始考虑编写一本有关的实用教材。这本《中国音乐考古学》，就是由此为缘起，也是以此为契机的。

现在，这本《中国音乐考古学》在热心的组稿人王耀华先生的不断“催逼”之下，总算完稿了。真想再认真地看上几遍，似乎已是机会难得。我真诚地希望它能够在使用的实践中，不断得到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借以修正缺点错误，逐步完善和丰富起来；并真诚地希望能以此书为开端，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资料基础上，有机会编写出更系统的音乐考古学专著，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

2001年12月2日于北京



王子初 1948年生，江苏省无锡市人。中国音乐史学家，音乐考古学家，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任副所长、常务副所长等职。

他长期致力于中国乐律学史和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主持过国家“七五”、“八五”、“九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编撰出版工作。主要著作有《荀勖笛律研究》、《中国乐律学百年论著综录》(合著)、《文物和音乐》(合著)、《国家文物定级标准参考图例·乐器卷》(待出版)等；于《中国音乐学》、《音乐研究》、《文物》等学术杂志上发表过大量专业论文。其论著多次获奖。所主持编撰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12卷本)于1999年9月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他还是国家重要项目“中华和钟”的主要设计者。

12-11-19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音乐考古学概述	3
一、音乐考古学的定位	4
二、神话传说和文献典籍记录下来的音乐史	6
三、音乐考古学对音乐史学研究的意义	8
四、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时空范围	9
第二节 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	12
一、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形成	13
二、中国音乐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17
第三节 音乐考古学的相关学科	23
一、与一般考古学的关系	24
二、与文献学的关系	26
三、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	29
四、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30
第四节 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32
一、乐器	33
二、图像	35

第二章 史前时期

第一节 史前时期概述	45
-------------------------	-----------